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访谈*

谢 欢

摘 要 2019年7月22日,南京大学谢欢博士对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就北美东亚图书馆发展相关问题进行访谈。东亚图书馆肇始于欧洲,起源于传教士对文史哲印刷文献的专题收集,与汉学发展紧密相关;美国东亚图书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如今美国已成为西方世界东亚研究的中心。华人图书馆员是北美东亚图书馆从业人员中非常重要的群体,三代华人图书馆员各具专长,为北美东亚图书馆发展做出了贡献。郑炯文先生自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以来,主要致力于以下三方面工作:①整理裘开明、吴文津担任馆长期间收集的文献;②开放馆藏,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资源面向全世界学者开放;③推动中美图书馆员交流合作项目。

关键词 郑炯文 哈佛燕京图书馆 东亚图书馆 汉学

分类号 G259

Make Library Open to All: Interview with Dr. James K. M. Cheng, the Librarian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XIE Huan

ABSTRACT

On July 22, 2019, Dr. XIE Huan who came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held a discussion with Mr. James K. M. Cheng, Director of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at the Yanjing Library of Harvard, USA. The topic of this discussion was the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the North America. Director Cheng pointed out that the East Asian library originated from the European Missionaries' systematic collection of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s,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Since World War II, with the r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enter of Sinology gradually moved from Europe to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same time the number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the North America began to increase rapidly. Th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library followed closely the spread of East Asian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in the postwar years. Today, 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probably the largest and most comprehensive one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re are now more than 100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North America which collected more than 10 million volumes of Chinese books. These collections strongly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美华人图书馆员共同体的身份认同研究(1927—2015)” (编号: 15ATQ002)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key project “Cultural China: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Librarian Community in North American(1927—2015)” (No. 15ATQ002)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谢欢,Email: weizhaizhuren@163.com, ORCID: 0000-0003-3883-2382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XIE Huan, Email: weizhaizhuren@163.com, ORCID: 0000-0003-3883-2382)

supported the 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North America. If by the size, these East Asian librari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is the large East Asian libraries (with more than 500 000 books), the second one is medium-sized East Asian libraries (with collections between 100 000 and 400 000), and the third one is small East Asian libraries (with a collection of less than 100 000). Director Cheng emphasized that although the size of these East Asian libraries is different, each one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tise. We can't evaluate which one is more important just according to its size.

Chinese librarians is a very important and special group among the librarians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so far, Chinese librarians in the East Asian librarie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generations: the first generation was the people who were good at Sinology and most of them went to the USA before 1949, however, English was this generation's weakness. As a result,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library in the North America, they were isolated to the American's academic libraries. The second generation was those who went to the USA between 1949 a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mainland China, and most of this generation were from Taiwan Region or Hong Kong Region. The second generation was good at English while the study of Sinology was weaker than the first generation. And the third generation is the people who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mainland China, this generation is not only fluent in English, but also has a high leve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ut the foundation of Sinology is also as weak as that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Director Cheng loved books and reading while he was a child, and he wished he could become a librarian and the career as a librarian made him feel very proud. When he studied and worked 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e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his tutor Professor Tsuen-hsuei Tsien. Since becoming the director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Mr. Cheng has been devoting himself to: 1) organizing the literatures collected by the former directors Alfred Kaiming Chiu and Eugene W. Wu; 2) making the collections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open to all; 3) promoting the librar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KEY WORDS

James K. M. Cheng.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East Asian libraries. Sinology.

谢:郑先生您好,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和我就北美东亚图书馆有关问题进行交流,您是目前北美东亚图书馆界的一位资深馆员,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北美东亚图书馆发展概况?

郑:我在美国东亚图书馆工作已经有40余年,对北美东亚图书馆还是有些了解。我认为东亚图书馆起源于对文、史、哲印刷文献的专题收集,所以在一般人观念中,东亚图书馆比较保守,与主流的图书馆有所区别。但无可否认的是,东亚图书馆在近阶段,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受科技的影响非常大,如今的东亚图书馆已经逐渐改变只收藏纸本的状态,开始采购很多电子文献。在北美,东亚图书馆的数量已有100余

家。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最早不是哈佛燕京,而是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等学校,哈佛燕京图书馆开馆于1928年。北美大部分东亚图书馆都是1945年以后建立的。东亚图书馆的发展与汉学(Sinology)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汉学发源于欧洲,当时欧洲传教士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返回欧洲后,开始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与语言,逐渐产生了所谓的汉学,汉学的发展带动了汉学图书馆的建立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所谓的“西方自由国家的领袖”,汉学发展的重心逐渐由欧洲转移到美国。目前而言,汉学最好的师资、最好的文献馆藏无可否认都在美国。

美国东亚图书馆各有特色,很难说哪家最好。我刚才说到的北美 100 余家东亚图书馆,按照规模来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规模较大的东亚图书馆(藏书在 50 万册以上),这类东亚图书馆主要分布在美国东部,且所在学校基本都是私立高校(国会图书馆例外),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等高校的东亚图书馆,美国中部只有芝加哥大学一所,西部则有斯坦福大学。另外,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多伦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也属于规模较大的东亚图书馆。第二类是中型的东亚图书馆(藏书在 10 万到 40 万册之间),中型的东亚图书馆以州立大学为主,如密歇根州立大学、威斯康辛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等学校的东亚图书馆;第三类是小型的东亚图书馆(藏书在 10 万册以下),如东部的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等学校的东亚图书馆。但是,我还是想强调,虽然规模有大小之别,但是每一家东亚图书馆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不能忽视。截止到目前,北美东亚图书馆收藏了超过 1 000 万册的中文图书。

就大型东亚图书馆而言,同样各有特色。比如哈佛燕京图书馆,其最大的特色就是中文、日文、韩文的善本图书以及 1949 年以前的中国地方志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了 3 000 余种 1949 年以前的地方志原本,数量超过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排名美国第一。其他如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的经部图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的近代文献资料、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文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收藏的文学资料等都非常有特色。

对东亚图书馆有兴趣的学者可以系统查阅《东亚图书馆杂志》(*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该刊最早叫 *Bulletin of East Asian Libraries*),之前钱存训先生每年都会对北美东亚图书馆的特藏进行统计,我对于东亚图书馆特藏的

了解,也是源于当时协助钱先生做调查。

谢:在北美东亚图书馆员群体中,华人图书馆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其中很多人对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除了裘开明、钱存训、吴光清等少数人之外,国内对于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北美东亚图书馆中的华人图书馆员群体吗?

郑: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华人图书馆员,到目前为止,大概可以分为三代,您提到的裘先生、钱先生、吴先生等人,他们是北美东亚图书馆发展的先驱,可以称为第一代。第一代人大部分是在 1949 年以前来的美国,他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学基础深厚,但是他们在语言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很难和美国人打成一片,因此逐渐被边缘化,由此也导致早期东亚图书馆在美国大学图书馆系统中被边缘化,很难融入学术图书馆的主流。第二代是 1950 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时期来美国的一批人,我应该也属于这一代,由于当时中国大陆还处于封闭状态,第二代人主要都是来自台湾地区或者香港地区,这一代人英语都很好,但是国学基础较差。第三代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到美国从事图书馆职业的人,这一代人英语很好,除此之外,计算机水平也很高,对新的科学技术很敏感,但是这一代人同样缺乏深厚的国学基础。所以说,每一代北美东亚图书馆中的华人图书馆员群体都有其优势,但也都有其不足。我不是学者,只是一位普通的图书馆员,没有精力做太多深入的研究,但是我很支持对这些前辈多做一些研究,多写一些文章,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这些前辈。

借这一问题,我也想说一下个人对于东亚图书馆未来发展的看法:未来东亚图书馆发展一定要“变”。以往,由于语言的关系,东亚图书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总馆拨付一部分经费(或者东亚图书馆从其他渠道募集部分经费)后,东亚图书馆独立采

购、独立编目、独立流通。不过,如今东亚图书馆的采编、技术服务、书库管理都已经和总馆统一。我个人认为,东亚图书馆一定要融入其所在学校的图书馆主流,不然,东亚图书馆发展会更加边缘化,这样是没有前途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很多同行不是很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认为东亚图书馆应该继续保持独立的状态。

谢:郑先生,您刚才讲到您是属于第二代北美东亚图书馆华人馆员,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来美国学习图书馆学以及图书馆职业从业经历吗?

郑:我是香港人,我从小就喜欢书。进入香港新亚书院以后,学习的是文学,但在新亚读书期间,我去图书馆义务担任助理,帮图书馆还书、借书,当时就很想当一名图书馆员。对于图书馆职业,我一直有一种偏爱。我不认为作为图书馆员别人就瞧不起我,我也没有觉得我一定得做学者别人才看得起我,我认为图书馆员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位,成为图书馆员是我一辈子的志愿。于是,从新亚毕业以后我就来美国学习图书馆学。我还记得,我到美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旧金山一家律师事务所图书馆任职,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帮助该所律师查核法律条文。这并不是太专业的图书馆工作,但是当时我的主管(名叫 Anita Head,来自瑞士)给我的一个建议让我受益终身,他说:“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你只需要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要在意你的职位有多高或多低。”此后,我不管在哪个图书馆工作,都恪守这一忠告。我衷心希望,所有的年轻图书馆同仁也能将这一句话牢记于心。不过,我并没有在这家律师事务所图书馆待很久,因为我决定去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深入学习图书馆学。到现在,我仍然坚持认为我只是一位微不足道的图书馆员,但是我不认为我工作没意义,这是我自己的初衷。

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毕业以后,我先后在三所学校图书馆任过职。在芝大快要

毕业时,正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时任馆长钱存训先生退休,于是,我就接了钱先生的工作。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了十多年以后,转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在UCLA工作了12年,1998年被聘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我服务时间最长的单位,到今年为止已经工作了21年。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一个传统,即每一任馆长任职时间都比较长。第一任馆长裘开明先生任职38年,第二任馆长吴文津先生任职32年,我是第三任馆长,到今年为止已任职21年。不过,我应该不会做三十多年的馆长,我已经在考虑退休事宜,我觉得应该早点把位子让给年轻人,因为每个时代都不一样,年轻人有他们的观念和思想,只有不断与时俱进,东亚图书馆才能有好的前途。

谢: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图书馆学以及您和钱存训先生交往的情况吗?

郑:我是上世纪7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接受的图书馆学教育,当时芝加哥大学还有图书馆学研究院。美国所有图书馆学课程都是从研究生阶段开始的,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设计。因为图书馆工作涉及的学科非常广泛,如果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图书馆员,需要以扎实的其他学科背景为基础,继而进行图书馆学培训,这一点与中国从本科阶段就开展图书馆学教育有所不同。

钱存训先生是一位要求非常高的学者,这一要求不仅体现在学生身上,他对自己同样也是如此。记得在芝大跟随钱先生读书时,不管是普通作业还是研究报告,经常需要不停修改,直到钱先生满意为止。当时,我与钱先生在芝大住得非常近,我也习惯了他在晚上11点打电话给我谈工作的事。钱先生基本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在闲暇时间也不太喜欢社交。钱先生的工作、生活方式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非常感谢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工作的这一段经历,芝加哥大学是一个非常适合学习、研究的地方,在那里,我也逐渐成长为一名图书

馆员。

谢:哈佛燕京图书馆和中国大陆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每年都会有中国学者到哈佛燕京图书馆进行交流合作,共同开发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tudies*)”是最能体现这一合作的成果,您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郑:1998年我从UCLA转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我只是一位很普通的图书馆员,而作为图书馆员,最重要的就是服务。来到哈佛后,我首先花了很大力气,把裘开明馆长、吴文津馆长任职期间搜集的文献整理好。我认为图书馆是一个富藏,但是如果外人不知道图书馆藏了什么,图书馆不对外开放,那么这个图书馆是毫无用处的,所以任何人只要需要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资料,我都开放。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论图书馆资料,全世界没有一个大学图书馆比得上哈佛。”哈佛大学图书馆全部藏书超过2100万册,种类繁多,虽然这些藏书都是哈佛的财产,但是这些藏书的内容不是哈佛的,是全世界的,我就是本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一态度,凡是学者要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资料,我都开放。我很喜欢哈佛大学的一句话“The World's Knowledge to Harvard, Harvard's Knowledge to the World”。我不知道我退休后谁会来接替我的位置,但我希望继任者能继续秉持这一开放的态度。哈佛的宝贝的确非常多,哈佛的确是做学问的地方。前不久,一位来哈佛访问的复旦大学学者回到上海后,给我发了一封邮件,他说:“在哈佛看书的确方便,我都不想走,最后一天,我一直到图书馆5点钟关门才很不舍地离开。”我回复他,欢迎他有机会再来哈佛。

由于图书馆涉及的学科非常多,我们很多同事因为学科的限制无法完全满足图书馆的需要。例如哈佛燕京图书馆有很多善本,但我们很多同事就无法编目,很多地方志、手稿同样没有办法整理。所以,我到哈佛后的另一个任务

就是发起了“访问馆员”项目。我到外面募集资金,每年从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请一些图书馆员到哈佛燕京图书馆访问一年,根据他们的爱好、背景,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藏,并帮我们编目、参与一些数字化项目。通过利用这些访问馆员的专长,让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藏流出哈佛,流向全世界。以前很多人都要专程到哈佛查阅资料,但是通过这些合作,很多学者不用到哈佛就能利用哈佛燕京的馆藏,嘉惠学者。我发起“访问馆员”项目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年轻人多出来看看,开阔眼界,同时多思考。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建筑虽然不如国内很多图书馆,但藏书是一流的。我个人认为,馆藏是图书馆的心脏,再漂亮的馆舍、再先进的科技,如果没有好的馆藏,那么仍然称不上一流的图书馆。但是,如果有好的资料,但不提供给学者利用,没有服务也不行。通过和国内图书馆界的交流,我发现以前中国的图书馆无论是建筑还是理念与海外图书馆都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通过近年来的发展,国内图书馆在硬件方面与海外的图书馆基本已经没有太大差距,有些馆舍甚至超过了美国,但是理念方面,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今年5月,我到中国某图书馆,该馆收藏了很多善本书,该馆馆长在接待我们时,我提了一个问题:“我们哈佛有一位教授,想利用你这边的一本善本,能否复制一份?”“不行!”这位馆长当时没有考虑就果断地拒绝了我!七年前,我去中国某省级图书馆特藏部参观,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但同样遭到了拒绝。我对于这两位图书馆员并没有意见,但是对于相关的政策颇有看法,图书馆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藏起来不让外人利用呢?不过,总体来看,国内图书馆的观念还是朝着开放的方向慢慢改变,很多图书馆的特藏也都开始影印出版。

谢:郑先生,您刚才提到您帮助哈佛教授寻找资料,我想问一下您觉得北美东亚图书馆对于北美的汉学研究或者说东亚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郑:从事汉学研究或者中国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学术资料,北美东亚图书馆最大的贡献应该就是学术资料的保障。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对外基本是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无法获得有关资料,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只能去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但国民党带到台湾地区的资料总体也不是很多。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国内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去中国大陆愈发频繁、便利,就中国研究的资料、资源而言,主要还是在大陆,要做真正的、深入的研究,还是得去中国。但北美东亚图书馆的作用是什么?最主要的还是方便。美国东亚图书馆还起了一个纽带的作用,如果美国学者需要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他们只要和我们说,我们就尽量帮他们找。

谢:据我所知,现在不少北美东亚图书馆发展都遇到了经费问题,一些东亚图书馆因为经费紧张,很多资料都无法整理,哈佛燕京图书馆有没有经费的问题?

郑:每个馆情况都不一样,就哈佛燕京图书馆而言,经费相对比较充裕,因为我们比较幸运,有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资助,另外,哈佛的资源相较于其他学校也更为富裕,这为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便利。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每年运行经费在500万美元左右,每年采购经费近200万美元。

谢:您觉得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前遇到的问题有哪些?

郑: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馆舍空间狭小,目前所在的这幢楼年代久远,且起

初并不是专为图书馆而建,160万册藏书近一半目前存放在他处。我们现在正在筹募资金建设东亚研究中心新楼(预算约一亿四千万美元),如果筹募到,哈佛燕京学社、东亚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图书馆都将有自己独立的一幢楼,由于所需资金数目庞大,该计划近几年内可能比较难落实。

谢:近年来,民国文献是国内关注的一个热点,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民国文献的研究与整理情况如何?

郑: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民国文献约1万多种,复旦大学图书馆龙向洋曾来哈佛燕京图书馆访问,他帮忙编辑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时期图书总目》《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文献丛刊》。哈佛燕京馆藏的民国文献,在北美东亚图书馆中数量也算可观,这些资料全都对外开放,欢迎学者来利用。

谢:近几年,很多北美东亚图书馆都编纂了本馆的一些书目或书志,如《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旧方志目录》《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目》等,但这些目录基本都是反映一个馆的收藏情况,北美的东亚图书馆有没有考虑编纂一些联合目录?

郑:联合目录我觉得并不难,但是有没有人愿意这么做还不清楚,至少目前还没有。

谢:郑先生,再次感谢您,期待下一次的交流。

郑:好的,谢谢。

谢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苏 南京 210023。

(收稿日期:2019-09-19;修回日期:2019-11-08)